

论郑观应学习西方富强之本的思想

——以《盛世危言》为中心

宋德华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学习西方富强之本的思想,是中国近代学习西方思潮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显著标志。他所阐释的西方富强之本,其总纲是“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其内涵则包括以政治为本、以格致为本、以学术为本和以经济为本等极为丰富且不乏深远之见的思想观点。这些观点将民主性的政治制度和近代化指向的大政方针作为国家富强的根本,表明郑观应对西方的认识和理解已达到相当准确而深入的程度。

关键词:郑观应;西方富强之本;议院;教养 《盛世危言》

中图分类号:K 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1)02-0080-08

在洋务运动时期学习西方的思潮中,郑观应力主学习西方富强之本的思想十分突出。如果将其置于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的潮流中来观照,可以看出它是这一潮流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的标志。^①

对于郑观应主张学习西方富强之本的思想,以往学界虽多有关关注,但大都限于简略征引《盛世危言》自序中的有关论述,而尚未结合书中其他诸多重要篇章详加探析,或虽对此思想的部分观点分别做过研究,但是还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认识。^{[1]91-95 [2]117-121 [3] [4]43-49}因此,对郑观应所十分看重的西方富强之本究竟是什么,尤其是这一思想究竟有何基本内涵和重要价值,还缺少必要的说明。事实上,通观《盛世危言》全书,有相当多的内容都

与郑观应学习西方富强之本的思想密切相联,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该著立论的主干。只不过由于该书还不是一部体系严密的论著,因而这种联系并不能一下子就看得很清楚,需要加以梳理分析,才能使其充分显现。本文的写作,就是试图在此方面作一较为具体的探求和阐释。

一、以“议院上下同心, 教养得法”为总纲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始写作《易言》一书起,郑观应就出于对列强侵略的愤恨和对中国艰难时局的忧虑,潜心探求西方富强之道,以作为改变中国贫

收稿日期:2010-10-09

作者简介:宋德华,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① 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思潮由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首开其端。“长技”所关注的是引入西方文化的某些器物 and 技艺,还停留在比较简单的功利性的利用层面。继魏源之后,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明确提出“鉴诸国”、“采西学”的重要命题,将学习西方上升到了一个具有某种普遍性原则意义的高度。尽管他对学习西方的具体拓展并不算多,但其思想直接促成了洋务运动的兴起,是近代学习西方思潮的重要发展。进入1870年代之后,随着对西方了解的增多和官办洋务弊端的显现,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批评洋务运动的缺失,积极探求西方富强之本,主张本末兼学,尤其要注重学习西方富强之本。这意味着学习西方的思潮又有了新的深化。郑观应就是这种思想主张的主要代表之一。

弱现状的良策。^①到写成《盛世危言》一书时,他已形成了十分明确的学习西方富强之本的思想。^②

对此思想,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做了概括性的论述。他首先批评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面对万国通商的时局,或言维新,或言守旧,或言洋务,或言海防,但不是是古而非今,就是逐末而舍本,没有几个人能够洞见本原、深明大略。接着回顾了自己对了解西方所做的努力和得到的收获,这就是在多年之中“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弊得失盛衰之由”终于认识到“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力;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凡司其事者,必素精其事,为文官者必出自仕学院,为武官者必出自武学堂,有升迁而无更调,各擅所长,名副其实,与我国取士之法不同。”^③

为了证明自己看法的可靠,他引用了曾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的一段话“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赜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对于这段话,郑观应称赞道“诚中之论也。”

他还结合清朝当局的洋务举措和外国人对他的评价进一步指出“年来当道讲求洋务,亦尝造枪炮、设电线、建铁路、开矿、织布,以起而应之矣。惟所用机器,所聘工师,皆来自外洋,上下因循,不知通变。德相卑士麦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非虚言也。”^④

在这些论述中,郑观应从不同的角度,对什么是西方富强之本做出了说明。内容虽多,若仔细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这两句

话是郑观应所总结的西方富强之本的纲领。前一句是指西方所设立的议院政治制度,它使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是国家获致富强的根本保证;后一句的所谓“教养”,是指作为国家基本大政的教民和养民之策,只有“教养得法”,富强才能落到实处。

在此纲领之下,郑观应进一步阐明了如何才能算得上“教养得法”,可分列为这样四大要点:一是兴办学校以培养人才,这是讲重视教育、知识和学问;二是改良耕作以尽地利,这是讲打好农业这个国家经济的基础;三是经营工商以使物畅其流,这是讲将作为国家经济枢纽的工商业全面充分地发展起来;四是实现各类官员的专业化和专职化,这是讲保证政府官员都是高素质的管理人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自序中作出简要概括之外,对于“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这一纲领的各大要点,郑观应还在《盛世危言》中设立若干专门篇章进行阐释,将其作为西方富强的根基之点。按照郑观应对纲领顺序的排列,这些篇章主要论述了议院、教养、学校、工艺、农政、商务、吏治等议题,形成了其西方富强之本思想中的议院观、教养观、学校观、工艺观、农政观、商务观、吏治观等核心观念。

若根据其实际内容进一步加以分析归纳,则可将这些观念整合为四个方面的论点,即由议院观和吏治观所构成的政治为本论,以学校观和工艺观所构成的学术为本论,商务观和农政观所构成的经济为本论,而教养观则单独具有部分总论的性质。这些论点,共同构成了相当系统的学习西方富强之本的思想。只有深入分析这些观点,才能对郑观应这一思想的丰富内涵和重要价值获得充分的认识。

二、政治为本论:设立议院和革新吏治

“议院上下同心”是郑观应列举的西方富强之本的首要之点。

① 见《易言》三十六篇本《自序》、《易言》二十篇本《自序》,夏冬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64、173页。

② 在写于1884年的《南游日记》中,郑观应已对学习西方富强之本思想做了初步的表述“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见夏冬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967页。

③ 《自序》,《盛世危言》第50-51页,引者对引文的部分标点有改动。

④ 《自序》,《盛世危言》第51页,引者对引文的部分标点有改动。

议院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具有何种性质,这是郑观应论述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对此,他下了一个最简单的定义:“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4]95}郑观应所说的“公议政事”,看起来一目了然,其实所包含的内涵要比字面之义丰富得多,需要根据他对议院制的论述作出具体的论析。

首先,所谓“公议”,主要是指民众之议。议院在本质上是民众表达政见的场所,通过议院就能“集众思,广众议,用行政一秉至公”,如果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4]95}郑观应的另外几段话将议院代表民意、民志的意思表达得更加清楚:“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措,询谋佥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合众志以成城,制治固有本也”,“即英国而论,蕞尔三岛,……卓然为欧西首国者,岂有他哉?议院兴而民智合、民气强耳”,“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4]95-97}这几段话分别以泰西各国、英国和中国为例,明确指出了议院以民为本、以民为体的根本性质。正是因为通过议院凝聚了民众的意志,国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才会具有强大的力量。

其次,作为议院成员的议员(主要指下议院议员)是由民众公举出来的民意代表,由他们议政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公议”。关于这一点,郑观应亦有详尽的论述:“议院为国人所设,议员即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难逃公论。”为了杜绝可能存在的滥选滥举的弊端,保证选出真正的贤者,规定选举者必须为“入本籍至十年以后,及年届三十,并有财产身家,善读书负名望”之人,否则不得出名保举议员。议员选出之后,其在议院发表政论要继续接受民众的监督,“议员之论刊布无隐,朝议一事,夕登日报,俾众咸知,论是则交誉之,论非则群毁之。本斯民直道之公,为一国取贤之准”,这样就能使“天下英奇之士、才智之民,皆得竭其忠诚,伸其抱负”^{[4]97}。为了说明“公举”必须以民众的选择为立足点,郑观应专门辨析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今日西方国家由选举产生的议员,不能等同于中国历史上非选举产生的“汉之议郎,唐、宋以来之台谏御史”,这是因为前者出于民,所以就能真正做到“公”而无弊,而后者与民隔绝,即使他们为君上所选用,也难免私心甚重,弊端重重。^{[4]97}

换言之,议员在本质上不能是君主属下的官员,而应该是对于君主保持着独立性的民意代表。

再次,在议院的“公议”与君权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政治关系。根据郑观应的考察,各国议院大都分为上下两院,“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部大臣任之,取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取其近于民也。……遇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君,以决从违。如意见参差,则两院重议,务臻妥协而后从之”^{[4]95}。按照这种体制和议事规则,“国事”的处理是君、民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君主已经失去了原所具有的绝对统治权,民众(通过下议院)的参与已成为政治决策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不过相比之下,君主仍占有明显的优势,因为上议院“近于君”,而君主又具有最后决定“从违”的权力。

议院制西方各国皆有,郑观应所论的议院,实际上主要是指君主立宪制下的议院。在他看来,美国、法国式的民主议院制“权偏于下”,而英国、德国式的“君民共主”议院制才完美无缺,在君权、民权之间能够做到“权得其平”^{[4]95-98}。他盛赞英、德议院制“适中经久”,“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对其所起的作用作了高度的评价:“盖有议院揽庶政之纲领,而后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智如一,百端皆有条不紊,为其君者恭己南面而已。故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4]95-98}郑观应所说的议院作用,本来应该是对西方国家历史的总结,但看起来更像是针对中国君主专制之弊所开出的一剂良药。

郑观应以中国化的方式来理解西方议院,还突出表现在他对应该设立议院所作的带有理论性的诠释。他引证中国历史典籍中关于君民关系的精辟传世之语,写道“中国历代帝王继统,分有常尊,然而明良喜起,吁咈赓歌,往往略分言情,各抒所见,所以《洪范》稽疑谋及庶人,盘庚迁都咨于有众。盖上下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天生民而立之君,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伊古以来,盛衰治乱之机总此也。……孙子曰‘道者,使民与上同欲’,‘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4]96}郑观应所引证的这些话,一些与他同时期的先进的中国人也常会引用,以表达君主应该抑尊重民的思想。

用中国传统的(当然也是有积极价值的)君民关系论为西方近代议院制做理论依据,这在当时是一种特定的思想文化现象。它一方面是由于西学的传播程度还非常有限使然,另一方面也真实反映了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这一时期中国许多先进人物所只能达到的思想理论高度。

将西方议院中国化的结果,就使开设议院的期望更加充满理想化的色彩。照郑观应的话来说就是,实行议院制可以同时满足君民双方的意愿和符合君民双方的利益,“君不至独任其劳,民不至偏居其易,君民相洽,情意交孚。……四海之大,万民之众,同甘共苦,先忧后乐,若理一人,上下一心,君民一体,尚何敌国外患之敢相陵侮哉”^{[4]97}。这种理想化当然并不现实。从西方近代议院制的演变史来看,议院之权从来就是民众的代表,具有与君权根本对立的性质,并在与君权的斗争中逐渐战胜乃至取代君权。失去统治大权的君主可以与掌握统治大权的议院共存,但这并不表明双方对国事可以“共主”,而从中国君主专制的历史和现状来看,要想君主在仍然握有“裁夺”权和“军国大政”权的情况下,能够与民众“权得其平”,那更是难以想象之事。

对于这种本不现实的议院理想,郑观应却仍然倾心相求,这与他希望设立议院的目的密切相关。对此目的,郑观应做过一段比较完整的论述“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4]97}郑观应建立了一条因果链:要行公法,就要张国势;要张国势,就要得民心;要得民心,就要通下情;要通下情,就要设议院。通下情是设议院最直接的作用,而行公法则为设议院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①[4]146-148}

由此可见,郑观应注重议院制,其根本的出发点还是国家的利益。既然以国家的强大为主,那么君主与民众的协调一致就非常重要,而“通下情”、“得民心”也就成了议院的标志性功用。郑观应虽然注意到了君权与民权的轻重问题,也提出了“君民共主”、“权得其平”的口号,但从其基本论述来看,他

对议院的追求和认识还缺乏强烈的民权意识。

设议院的根本目的是要使“上下同心”,这里所说的“上下”,实际上指的就是“君民”。但在君与民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必不可少的连接者,这就是官吏阶层。欲求“上下同心”,同时也就必须革新吏治,所以吏治是与议院处于同一层面即政治层面的重大问题(从后文中可以看到,两大问题事实上存在着相互交织的关系),郑观应对革新吏治的论述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郑观应所说的“吏治”,指的是国家选拔和使用官吏的各项制度。他认为官吏队伍的状况如何,与国家的治乱关系极大“地方之治乱,视官吏之贤否为转移;朝廷求治,亦视用人何如耳。一县得人则一县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一省得人则一省治,天下得人则天下治。”^{[4]119}可见只要官吏选拔使用得好,从地方到整个国家的治理都有了可靠的保障。基于这一认识,郑观应针对中国官吏制度方面存在的各种严重弊端,从西方国家的做法中寻找和总结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是为官必须学有专长,长期专任专用。这本来就是中国上古时代的做法,而中国后人已经丢失,在西方国家却能发扬光大,如规定“户部人员不能调刑部,陆路提镇不能调水师。学古入官,量才授职,自何部何署出身,日久升迁,终于为此部之首领而已。爵可崇,俸可增,而官不迁移”,因此就能“职既专而事无旷废,任愈久而识更精深”。郑观应称赞说“富强之原,实基如此。”^{[4]120}

二是应由议院来掌管官吏的选拔和使用大权,并派人参与和监督官吏的政事活动。与中国官吏选用之权掌于君主及其所控制的吏部手中不同,西方国家“独无吏部之设,无选之条,百僚升降权归议院,期会之令出自君主,选举之政操自民间”^{[4]120}。这就意味着任何官吏的任职都要得到民众的认可,而官吏日后的前程如何必须由议院来把关,这就势必改变官吏原来只对君主和朝廷负责的性质。与此同时,在官吏审案时,实行陪审制度,无论是“爵人”(授人官职),还是“刑人”(定人之罪),都能公之于众,将官吏置于民众的掌控和监督之下。^{[4]120}

三是用当地人(“土人或久居其地者”)为官,

① 郑观应所说的“行公法”,是指我应以“公法”待人,同时也希望别人以“公法”待我。换言之,就是指中国应以独立主权国家的身份,在世界上获得与各国平等的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能“张国势”,也就是要使国家强大起来。

“无回避本省之例”。“回避本省”是中国实行的一种制度,而西方的做法恰恰与此相反。“泰西地方官非土人不用,非土人不举者,恐其不能尽知风土人情利弊。凡属身家清白有产业者,均许保举人材,考察录用,与中国上古行乡举里选之例无异。”郑观应对此做法的评论是“盖既洞悉其风土人情,自收驾轻就熟之效也。”^{[4]120}

除此之外,郑观应还对英、法等国在“吏治”方面的其他做法作了不少介绍,可见他对官吏必须“得人”的高度重视。

三、“教养有道”与“格致为本”论

如前所述,在郑观应学习西方富强之本的思想中,“教养”是与“议院”并列的具有纲领性意义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他撰写《盛世危言》自序时,只是从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官精其事的角度做了非常简单的解释性的说明。真正作出专门的论述,是在该书《教养》篇中完成的。虽然同为纲领性问题,“教养”所涵盖的内容实际上比“议院”要宽广厚重得多(将学校、工艺、农功、商务、吏治皆包括在内),因此这一篇章对于了解郑观应学习西方富强之本的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

郑观应对“教养”的意义做了这样明确的界定:“夫天生民,以教养托之于君,故有国家天下者,其责无过于教养。”^{[4]220}可见,教养是君主和国家最重大的责任。然而,正是在这一重大问题上,中国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危机,十分迫切地需要向西方学习。

他回顾了人类教养之道起源的历史,指出中国文明本来在世界上出现最早,唐虞三代之时教养之道已臻于极盛。但三代之后,由于群起争雄、人各自私,特别是暴秦“焚书坑儒,务愚黔首”和明代科举制对天下人才的“锢蔽”,中国教养之道便“渺矣无闻,政治民风江河日下”。时至今日,重振教养之道就成了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4]221}

怎样解决教养问题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学习西方。对此,郑观应做了非常明确的论述,指出现今世界上有两类国家:一类是因教养有道而“勃然而兴”,一类是因教养失道而“忽然以亡”,西方各国就属于前一类国家。

对西方国家的教养有道,郑观应赞不绝口:“试观英、德、法、美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序

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有所教。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校之中。……其所教由浅而深,自简及繁。故人之灵明日启,智慧日积,而人才济济,国势以强也。是故人材众则百事兴,举凡机器、制造、轮船、火车皆巧夺天工,日新月异,而农政、商务亦日增新法,日为推广,市无游民,廛皆食力。如是则士得教而民有养,甚至痲疾、贫老孤婴亦皆有院以周恤之,无一夫不得其所。此教养有道,而英、德、法、美诸邦勃然隆盛也。”^{[4]221}

作为鲜明的对比,郑观应列举了印度、安南、缅甸、暹罗等国教养失道的乱象:“上失教养之方,下无奋兴之士,繁法严刑,横征暴敛,无异虐秦。贿赂公行,买官鬻爵,奸恶诈伪,上下相蒙,加之河渠不治,田畴日荒,士无所学,民多好闲,农工废业,商贾乏资,百姓流离,盗贼遍野。此其教养失道,国势凌替,而先后沦亡如出一辙也。”^{[4]221}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郑观应所说的“教养”是一个含义相当宽广的概念,它以民生为主体,而涵盖了教育、经济、社会乃至刑法、吏治、赋税等各个领域。在所有这些领域中,西方的“教养有道”都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值得中国仿效,因此,必须全面地向西方学习。与此同时,西方的“教养之道”,又是以学校培育人材为起点和中心,由于学校培养了众多的人材,于是各行各业得以兴旺发达,各种民生问题也就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因此,学习西方的教养之道,关键又在于学习西方的立学之道。

对此立学之道,郑观应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见解,就是将“格致”摆在其中更为核心的位置。

他论述说:“学校者人材之本,格致者学问之本”,“故西人广求格致,以为教养之方。盖世界由弋猎变而为耕牧,耕牧变而为格致,此固世运之迁移,而天地自然之理也。顾格致为何?穷天地之化机,阐万物之元理,以人事补天工,役天工于人事。能明其理,以一人而养千万人可,以一人而养亿兆人亦无不可。我中国生齿四万万,人民甲于五大洲,子此元元,可不亟图教养之方哉?今日之计,宜废八股之科,兴格致之学,多设学校,广植人材,开诚布公,与民更始。庶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复还也。不然,则天生斯民而托以教养之责,不独不能行,反暴敛以困之,势利以诱之,而犹欲以空名自跻于三代之隆,则吾谁欺?”^{[4]222}

这是一段极为重要的论述,包含了若干深刻的

思想内容,值得细加分析。

其一,郑观应将“格致”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与“世运”联系起来,像“弋猎”(渔猎)、“耕牧”(农耕)一样,成了一个大历史时代的称号。^①这对于格致的意义来说,是一个很有深度的拓展,本来纯属于自然科学或科学技术领域的格致被赋予了极高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精神的价值。它与天地万物的根本之理联系起来,被视为洞悉造化、破解万物的非常精深神奇的东西,这不但彻底摒弃了守旧者的“奇技淫巧”之说,而且使人对其不能不怀有仰慕敬畏之心。它还与“千万人”乃至“亿兆人”的生计联系起来,只要掌握了“格致”之理,人类的生养这一头等的难题就迎刃而解。郑观应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在无意中科学伟力做了一次最具想象力的赞颂。

其二,正是基于格致的重要,郑观应将“兴格致之学”当成了振兴中国的一大枢纽。要实现起“百王之弊”、复“三代之盛”这些极为宏伟的文化理想和政治目标,首先都要从“兴格致之学”及采用“西人教养善法”^{[4]222}做起。由兴格致以奠学问之基,到办学以育所需之材,再到振工商农兵以求国家富强,济贫扶困解难以完善民生,这就是郑观应学习西方所形成的一条完整思路。

这种“格致”为本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开了后来“科学救国”思想的先河。如果长远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之一就是“科学”,此后科学思想不发达也一直是难以实现现代化的一大瓶颈。郑观应较早就对“格致之学”如此重视,应该说是一种远见卓识。

四、学术为本论:兴学育才与注重工艺

在“教养”论中,已涉及学术为本的问题,但郑观应对此还有“学校”和“工艺”专篇进行论述,显示出他对学术也像对政治一样高度重视。

先看关于学校的论述。

郑观应将学校看得很重,认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4]60}他进一步强调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究其盛衰兴废,固各有所以

致此之由。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4]76}

郑观应指出,早在中国上古,学校就备受重视,“古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故其时博学者多,成材者众也”。他进一步阐释说“先王之意,必使治天下之学皆出于学校,而后所设学校非虚,其法始备,此学所以为养士之要,而上古人才所以出于学校者独盛也。”^{[4]60}这就不仅展示了中国上古学校体制的完美,而且将学校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先王之意”的高度来加以肯定。可惜的是,学校制度在中国后世遭到破坏,结果就使得国家无有用之学和可用之才。

中国丢失了的学校制度和立学精神,在西方却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并在宏大精深的程度上远远超过了中国上古。对于各国学校制度,郑观应作了多方面的详细介绍。他特别强调西学为西方学校的精华,值得中国引进接受,如果能将“西国有用之书”一一译出华文,颁行国内各书院,使人人得而学之,那么,“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才之众,竭其聪明才力,何难驾西人而上之哉”^{[4]62}。他更希望中国能像西方一样,尽快建立起发达的学校制度以培养人才,“如我国能仿俄国或日本,衰弱之时痛除积痼,幡然一变,各省亦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认真讲求……则各艺人才何患不出?自足与泰西争强竞胜矣”^{[4]64}。这些论述贯穿着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精神,同时也表明了要赶超西人的勇气和信心。

再看关于工艺的论述。

工艺也称为技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工艺的地位极低,与国家富强更谈不上有何关系。针对这种偏见,郑观应十分明确地指出,不论是在当今西方各国,还是在中国上古,工艺都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受到高度的重视。

他介绍西方说“夫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如英国,在西方各国中堪称技艺“最精”,而美国也像英国一样注重工艺。他还根据西方报刊所载资料,列举了英、俄、德、法、奥、美等六国富强的概况,以具体数据证明六国之所以富强,工艺发达是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其工艺之多,土产之盛,国人之富,亚洲远不及也”^{[4]389-393}。这些评介极有说服力,

① 今人通常将“农耕”之后的社会称为工业社会,郑观应则将其称为“格致”社会,其含义已颇为相近,因为工业社会对“格致”有很大的依赖性。郑观应的说法不但抓住了工业社会的关键,甚至还有点超前的意味。

可以说完全颠覆了将工艺视为末务末学甚至“奇技淫巧”的陈腐之见,为国人重新认识工艺的重大作用打开了眼界。

谈及中国上古,郑观应同样充分肯定“工艺一道,为国家致富之基,工艺既兴,物产即因之饶裕。中国文明早启,向重百工”,可惜后世“固步自封,罕有竭耳目心思以振兴新法者,何怪乎国中贫惰而外侮日乘也”。因此,“欲救中国之贫,莫如大兴工艺”。^{[4]394}他对中国后世丢掉上古重工艺的传统尤为痛惜,对此段历史专门作了批判性的回顾总结,以“古圣王”的名义,重新定义了工艺利国厚民的重大作用,并将其置于经典教义的崇高地位;对中国“才智之人”和“聪明秀颖之士”皆不愿研习工艺,以致中国工艺日渐衰落,表示了极大的不满。^{[4]389}这种反省,已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文化的根底。

五、经济为本论: 振兴商务和更新农政

如果说学术为本在“教养”中属于“教”,那么,经济为本就属于“养”。“教”主要属于精神文化层面,“养”则主要属于物质文化层面。经济是一个非常宽广的领域,其中“商务”和“农政”两大实业,被郑观应作为西方富强之本的基点。

郑观应对商务的论述,是从对“商战”的认识入手的。他明确指出,自中外通商以来,外国是在两个领域与中国进行作战。一个是军事方面的兵战,一个是商贸方面的商战。两者相较,商战要比兵战厉害得多。这是因为“彼之谋我,噬膏血非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兵刃。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则举之如发蒙耳。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掎克敝国无形。”^{[4]292}中国要图富强,就需要同时与西方展开兵战和商战,不过两者相较,商战还是比兵战更为重要,所以郑观应又强调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4]292}

既然要进行商战,根本的落脚点就是要将商务发展起来。而在这方面,西方是中国学习的最好榜样。郑观应以其多年来对西方发展商务的观察和了解,以及自身从事经商活动的实际体验,从多方面论述了西方如何重商强商的经验。

其一,国家将商务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商与国的关系上,“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4]299}。“元气”和“血脉”都关系到国家

的根本,所以,中国以农立国,而外洋是“以商立国”。在商与民的关系上,商一方面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即需要相互依赖,缺一不可;而另一方面,商又显示出独特的重要作用,“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4]303}。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从来都是“士”居四民之首,而“商”居四民之末。郑观应将这个顺序颠倒了过来,将商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这不仅表明了他重商的立场,而且说明他对近代商人群体兴起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有了某种自觉的认识。

其二,国家对商务采取了非常有力的发展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政府设国内专管商务的官员——商部大臣,设国外重点管理商民的官员——领事,及提供保护商民的武力——兵轮;国家对商务有统计考察,设学校专门研究,发奖牌给以鼓励;商力不足国家出钱资助,商本过重国家减税扶持,为商务立法定制务求详备并切实施行;商人普遍设有自己的组织商会,拥有足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等等。^{[4]303}对于这些纲领性的举措,郑观应在论商务的各专篇中还有很多具体的阐述和发挥。其总的精神,就是国家应全力讲求和发展商务,尤其是要为商民开展商务活动提供最有利的条件和最有力的保障。

其三,发展商务需要把握和利用各种条件。郑观应以孟子所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语为纲,对商务何以兴旺的条件进行了论析。他先以英国这一著名的“商国”为例,将其兴旺的原因归结为13条,并与中国进行比较,认为中国所缺者不在天时地利,而是在人的因素方面,^{[4]314}从而既总结了英国商务成功的经验,又找出了中国所存在的重大差距。除英国外,郑观应还从全球的角度论述了发展商务的条件,指出“贸易之道”不能只知道如何进行物资的交换,还要懂得“国政民情”与商务相“维系”的道理,“明乎此而后商务可得而言矣”^{[4]314}。这实际上就把商务的发展与整个国家的发展连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只有使国家的各项事业都兴盛起来,商务的兴盛才有了可靠的保证。

与对商务的论述相比,郑观应论述农政的篇章较少。但从其所论内容来看,他对农政的重视程度,其实并不亚于商务。

郑观应论农政有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就是君主和朝廷对民众应负起教养之责,“盖天生民而立之

君 朝廷之设官以为民也”。上古之时,帝王设有地官司徒之职,“实兼教养”,而孔子亦主张“富之教之”;古时任地方官者“劝农课耕”,卓有成效,而“近世鲜有留心农事者”。不仅不省心,而且是漠不关心,“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视民之去来生死,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然”,由此就导致了“天下流亡满目、盗贼载途”的严重后果。要解决这一问题,郑观应提出的办法是“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具备,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4]430-405}这就将农耕之业与国家的富强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郑观应认为,搞好农耕之业的根本在于人力的“勤惰”,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就足以弥补自然条件不好所造成的缺陷,而西方国家的务农之法正是这方面的榜样。对此,他做了相当详细的介绍。^{[4]402-403}总括其论述,西方务农之法可归结为两大要义:一是政府对农事非常重视,所谓“事事讲求,不遗余力”,从各方面充分发挥了指导、支持和促进的重要作用;二是大力采用科学方法务农,郑观应笔下虽然还没有出现“科学”一词,实际上他所说的“良规”、“良法”、“专学”等,都已属于农业科学的范畴。有了这两方面的结合,农业的发展卓有成效,自然就没有疑义。

综上所述,对于何为西方富强之本,郑观应形成了相当明确而完整的认识。其总纲是“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在其内涵中则包括了以政治为本、以格致为本、以学术为本和以经济为本等极为丰富且不乏深远之见的思想观点。从总体上说,这些观点将民主性的政治制度和近代化指向的大政方针作为国家富强的根本,表明郑观应对西方的认识和理解已达到相当准确而深入的程度。尽管他的实践活动还未超出洋务运动的范围,但在思想认识上已经走在社会思潮发展的前列,在很大程度上为洋务运动向维新运动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准备。

【参考文献】

- [1] 夏东元. 郑观应传[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 [2] 刘圣宜. 近代强国之路的探索者郑观应[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 [3] 王贻梁. “七尺身躯大丈夫,百年世事竟如何”——郑观应与《盛世危言》[M]// 郑观应. 盛世危言. 王贻梁, 评注.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 [4] 郑观应. 盛世危言[M]. 王贻梁, 评注.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王素琴]

Zheng Guanying's Thoughts on Learning from the West as a Way to Resurgence and Prosperity

——From *Warning in the Heyday*

SONG Dehu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China)

Abstract: In *Warnings in the Heyday*, Zheng Guanying puts forward the ideas of learning from the west as a way to resurgence and prosperity, which clearly indicates that China's contemporary trend of learning from the west has reached a new stage. The general principle, "To Govern with Concerted Efforts and to Educate in a Right Way", which involves various fruitful and insightful ideas that regard politics, cultures, education and economy as the foundation of a society, is Mr. Zheng'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prosperity and powerfulness. Taking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general policy of modernization as the key to prosperity and powerfulness, Mr. Zheng has demonstrated an accurate and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success.

Key words: Zheng Guanying; the foundation of western prosperity and powerfulness; Parliament; education; *Warning in the Heyday*